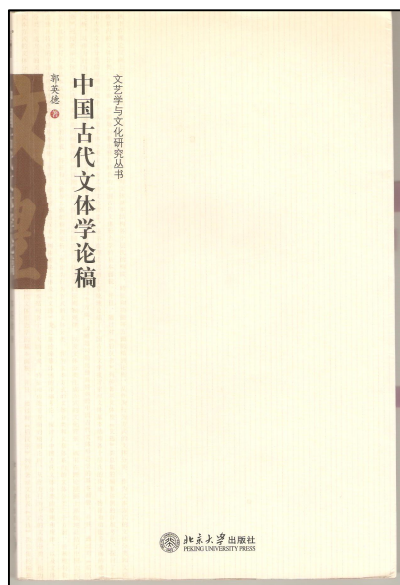


## 評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

劉怡青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郭英德 著  
《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33 頁 (含叢書總序 6 頁)

郭英德先生《中國文體學論稿》一書主要來自於 2001 年至 2005 年間，發表文章的集結，就書中前言所述，其認為「中國古代文體學的歷史發展和理論構成相關問題的研究，仍有許多學術空白亟需填補」<sup>1</sup>，故郭先生將論文的焦點放在對於文體及文體學之間的關係，透過專題式的系列討論，從歷代文集、《文選》類總集為出發點，就其時代關係及歸類的方法，來觀察中國古代文體

<sup>1</sup> 郭英德，《中國文體學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1。

的發展概況，並對應中國的生活思想，在實際操作中以見文體思想脈絡的改變。就此，本文首就《中國古代文學論稿》一書的章節內容作概述性的介紹，後則針對此書的貢獻、啓發及建議提出個人的看法。

郭英德先生《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一書中共收有八篇文章，若就其架構而言，作者透過此八篇文章，討論中國文體的結構、形成、及傳承這三個問題。在論中國文體的結構部分，見於〈中國古代文體型態學論略〉一節，郭英德先生透過前人研究的討論，將中國文體的結構從內而外分作體制、語體、體式、體性四個部分，並透過此四個文體結構的介紹，分別舉出歷代學者的批評及看法，從中得知中國文體的諸多樣貌。在中國文體的形成部分，提出中國文體的生成主要有三個途徑，一爲行爲方式，二爲文本方式，三爲文章體系<sup>2</sup>，在此部分主要見於書中〈由行爲方式向文本方式的變遷〉及〈文章的確立與文體的分類〉兩章之中，行爲方式所指的乃是中國文體的形成與其所因應的功能及社會功能有關，是一種特定行爲之下所造成的文體，此種形成文類的方式繼而影響著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郭英德先生在討論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時，舉《尚書》及《詩經》兩書爲例，其中《尚書》六體的出現，所代表的是文體從一種動作（動詞）轉爲專有名詞的過程，亦即是先有特定的行爲方式（如誥、誓等），後出現有紀錄特定行爲的文本（《尚書》），繼而形成文體類型（如〈湯誥〉、〈湯誓〉等），而後人則以此爲根據化分出不同的文體。至於在韻文的部分，郭英德先生舉《詩經》作爲討論的焦點，並點名《詩經》的文體分類包含著一種行爲方式到文本方式的轉換過程，其引用王小盾先生對於六詩的看法，認爲「風、雅、頌、賦、比、興」爲一種行爲方式的分類，後統納爲詩（風）、雅、頌三體之中，並且即以此三者爲《詩經》的基本分類，而在論風、雅、頌三體時，亦指出此三類的區分含有中國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的要義，即「體用不二」、「義例合一」的觀念，不論《尚書》或是《詩經》，其所編輯的過程，所依據的即是這種透過行爲所確定下來的文體，繼而「以類相從」，成爲不同的文類區塊。在對於文章所造成的文體分類，郭英德先生從漢代「文學」與「文章」分流做爲起點，認爲劉歆獨立出專屬於文章的《詩賦略》，即爲文章體系內文體分類的發端，爾後影響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與文體相關的論著，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蕭統《文選》等書，此類書籍以「因

<sup>2</sup>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頁 29。

文立體」作為分類的方法，「異中求同」則為歸類的原則。

延續文體形成的討論，在〈《後漢書》列傳著錄文體考述〉一文中，藉由范曄《後漢書》列傳中傳主著述的紀錄，上溯漢代《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國志》中文章著述記載之情況，以言在《後漢書》出現之前，文獻分類及文體分類的概念已開始萌芽。這些概念的實踐，透過對《後漢書》中列傳中著述記載的分析，就其歸類方式及排序原則的考述，得出《後漢書》的歸納方法承襲著「因文立體」的方法，「因文立體」方法能成立乃是來自於有大量的文體作品出現所支持。在排序原則的部分則認為范曄先經、史、子後獨列文辭的劃分方法，承繼著東漢中期以後，經學與文辭相對的觀念，而文辭次第有韻之文在先，無韻之筆在後情況，更呈現出文體辨析的觀念已漸趨明朗，因此而成為文體排序的基本原則。透過范曄《後漢書》的討論，郭英德先生認為范曄處理列傳傳主著述的方法，除體現出六朝時期文人對於文體觀念，更重要的是，如此的文體觀念影響著文集編撰時所呈現出來的相貌。

經由《尚書》、《詩經》、《詩賦略》對於文體源流追溯，《後漢書》在文體概念的形成的探討，《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全書的第三部分，關於《文選》類總集的討論，可以說是對於上述的內容做概念性的實踐，亦是全書的重點所在。《文選》類總集的討論計有四篇文章，在編纂體例與選文範圍中，首先論述總集類文選的歷史淵流，除《文選》外，針對不同時代的代表性總集類作品，如《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鑒》等八本書作為其取材的對象，概論性的介紹各書的特色及區分文體的情況，而針對這類的總集類文選的收文範圍，指明歷代的作品基本上依循著《文選》選文的界限而略有增損，並述歷代文選類總集選文範圍的增損狀況，歸納出這類總集選文時五條基本體例<sup>3</sup>。透過歷代《文選》類總集的介紹，在這類文集分體歸類的狀況，首先說明其所觀察到的六種基本類型及所屬的文類，而透過《文選》類總集分類的討論，可瞭解各類文體流變或增減的情形，如此分類的情況，郭英德先生進一步探討對於文體命名與分體歸類的之間的關係，特別提出「功能命名法」是中國古代文體最基本的命題方法，並影響著「篇章命名法」與「類同命名法」的成立，《文選》之

<sup>3</sup> 此五條基本體例分別為：一、歷代《文選》類總集所選「文」或「文章」，一般不包括經籍、史籍、子籍；二、歷代《文選》類總集總是詩文兼收；三、歷代《文選》類總集在詩文中，兼收實用性文體、說理性文體、敘事性文體和抒情性文體；四、在歷代《文選》類總集中，科舉考試文體，有的入選，有的不入選，其標準蓋在其是否符合「文」或「文章」的基本型態特徵；五、從宋代以後，在《文選》類總集中，往往選錄文人「以文為戲」之文與民間實用性文體。見《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頁113~115。

後各書文類分合的情況，乃是在於時代、事件、使用者的差異，讓文體的功能特徵發生變異，而此「文本同而末異」的狀況，作者上推到來自於中國哲學思想特徵，而此同中見異、異中見同，是中國文體進行分體歸類的精髓，而《文選》類總集的分體歸類則是體現出這種人文的思想，延續這一個討論，對於文體的分類，若著眼於行為或功能對文體進行分類，會傾向將文體「類分」，若是著眼於形態特徵時則會將文體「類從」，而在中國文體「類分」與「類從」的過程中，郭英德先生認為「類從」的方法所昭示的是文體的文學性特徵，而此對於文體分類學理的建設具有其學術價值。

在《文選》類總集的排序的規則方面，透過表格的建立與資料的對比，以瞭解其中的規律性，首先就《文選》的〈目錄〉及〈序〉與《文心雕龍》的類目進行比較，找出文體排序中先文後筆的語體特徵、先源後流的時間特徵、先公（朝廷）後私（地方）的空間特徵、先生後死的功能特徵及先雅後俗的審美特徵等五種排序基本規則，這五種基本規則運用在文體排序時，所呈現出來的情況是一種隨機性、綜合性的特徵，而如此規則及特徵亦是被歷代的《文選》類總集所運用。透過這樣表格建立的方法，郭英德先生針對《文選》類的歷代九部總集進行比對，得出在明中期以後有自覺的進行文體分類，在此類總集編纂時，較以往更善於聯繫、整合文體，文體序列包容性更強，序列的簡化和整一化，顯現出文體「以類相從」的方法已成為定律。對於體類排序觀念如何形成的討論，五種基本規則自有其所對應的文化觀，如先文後筆乃是來自於中國古代的學術文化分類觀念，先源後流則是「通古今之變」的歷史觀念，先公後私根基於尊卑親疏的宗法觀念，先生後死源自於「重生」的傳統倫理觀念，先雅後俗則為雅俗之辨的文化觀念。

對於《文選》類總集的討論，郭英德先生最後透過其中的二級分類來看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體式與原則。在二級分類的中，分類時其所依據的方法有以體分類、以題分類及以時分類三種，以上三種以依主題、題材等為區分對象的「以題分類」最常運用在二級分類中，針對這三種分類方法的發展時間，以體分類發展時間最早，以時分類則最晚，如此的時間順序，乃是對應著文體發展過程中，因應人類社會行為產生特定的文體後，文人開始「以類相從」收集、針對不同文體以不同體目的仿作，而當文體達到一定作品量時，以時區分的作法亦應時而生。對於分類原則這一部份的討論，郭英德先生以分類學的概念來觀察

《文選》類總集的分類情況，得出從《文選》開始並無一個嚴格的分類標準在，因此造成歷代的總集進行分類時產生了混淆的情況，這些總集在編纂的過程中基本上違背了分類學的原則，而這種情況的產生，與中國傳統思惟中的以主體為主，故在面對文體分類的情況時，不是一種客觀的觀照，而是主觀上的認知。

郭英德先生對於文體的研究，《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出版之前，尚有《明清傳奇戲曲文體研究》一書<sup>4</sup>，觀察郭先生的研究概況，主要是集中於明清時期的戲曲研究，明清時期中國各種文體亦已成熟，各家對於文學批評或文體的討論自此蓬勃發展，或許在此觸類旁通之下，自2000年起郭英德先生將研究重心的觸角延伸到文體學的研究，並逐年申請相關研究計畫，本書即是其近幾年來計畫研究的成果。雖然《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是單篇文章的集結，但就書籍章節內容的編排，循序漸進，由概論進入實際資料說明，讓讀者可以清楚的知道郭英德先生對於中國文體的看法並非空穴來風，而是透過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理解，以及歷代文選總集分類的整理，將其研究發現及討論的重點，有系統的逐步建立，即如同其書中所述，其學術研究的方法為「問題—文獻—歷史—理論」四位一體的模式<sup>5</sup>。

由上述這個研究模式來看《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一書，除了歷代文體理論的參詳仔細外，亦對於中國文體形成的方法，以及《文選》類總集的分類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建立體例，使研究者可以透過本書的研究方法及成果，更進一步的對文體或文體學有新的方向及認識。郭英德先生對於文體的討論，所朝向的方向不是單一的文體、朝代或文學理論的討論，主要是站在於文體如何產生，以及觀念的建立或改變等面向來看中國文體的發展，特別是在對於文體的類別及分類上，由文集的編目及分類的情況，來看歷代文體的分合及流變，並透過表格的建立及比對，可以清楚的看到歷代《文選》類總集收錄文體的情形，此對於單一文體的流變或歷代文選編輯概念等研究，先行做了整理的工作。除此之外，針對表格所呈現出的情況，郭英德先生從中得出中國文體在《文選》類總集的編排基本體例，並藉此觀察歷代此類總集是否在體例上有所改變，在不變之中，為中國古代文體找出一個恆定的原則，在改變之中，得出一個時代文體的增減，或隨著不同文體的加入，對文體的功用及看法呈現出

<sup>4</sup> 郭英德，《明清傳奇戲曲文體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sup>5</sup>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頁218。

何種新的面目。

郭英德先生對於中國文體的研究，替所有的研究者提供一個可供參考的方向，亦對於中國文體論的發展史，條列的提出其所觀察到的基本原則及體例，這些原則及體例所對應的乃是整體中國文化思想、社會意識等價值觀念，因此對於文體學的研究，不能只將研究放在單一的文體體例上，而是要更進一步的瞭解整個時代文化氛微，從各個角度來觀察文體所透露出來的訊息。此外，郭英德先生亦試圖從其他學科的觀念導入對於文體分類的研究，以現代科學的眼光來觀察中國文體分類的過程，得出的結果雖然顯示出中國文體在分類時無法符合分類學的條件，但這更進一步的說明，中國文體在分類或是編撰的過程中，因思惟模式偏主觀的自我關照，所以無法直接將其他學科帶入，而是必須再仔細思考在運用理論時，在論述的過程之中如何取決及應用，在其研究中透過實證與現象的說明，做了最好的示範。

中國文體的發展多元且複雜，如同書中所述，文體發展始自於社會功能上的需求，隨著需求增多或是功能的細分，因此派生出不同的文體出來。就此觀念來看，中國文體的發展在實質上本於功能的需求，如章、奏、表、議等乃來自於官職細分之下所因應而生的文類，因此歷代《文選》類總集在文類的增減，若能對應到各個朝代的社會環境，看文體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社會分工或功能需求的關係，更可以突顯出中國文體發展的多元性以及時代性。郭英德先生此書主要焦點放在理論上的探討，故《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一書在陳述的過程中，指出概念卻尚未有深化的討論。此外，此書是集結作者歷年的研究成果，或許礙於篇幅的關係，故對於問題的討論無法全面性的開展，以及同一概念性的論述，重複性的出現於不同篇章之中。

作為一個讀者而言，上述的問題是本書美中不足之處，但對於郭英德先生的研究仍是瑕不掩瑜。總而言之，《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引領研究文體或文體學時一條可以思考的路，即如書中後記所言，「學術研究，不僅要在前人已經耕耘過的土地上進一步深耕細作，而且更要在前人未開闢的土地上筆路藍縷」<sup>6</sup>，在郭英德先生本書的各篇文章中，可知其所下的苦心及用心，在理論與實踐之中，為有志於文體或文體學研究者，提供新的方法及可以繼續深耕的園地。

---

<sup>6</sup>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頁 218。